

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学学术形成的关键意义※

● 焦振廉

关键词 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 中医学

系统的中医学学术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以《黄帝内经》的出现为成熟的标志。那么,与中医理论形成有密切关系并一直在指导着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又是何时出现于中国思想之坛的呢?语言表达思想,文字记录语言。古人的思想除非形诸文字,否则今人是无法得知的。殷人重巫右鬼,因而郭沫若先生认为殷人是极富想象能力与浪漫精神的民族,殷墟甲骨尽管只是“卜辞”,已足以支持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但是,我们也惊异地发现:甲骨文中只有“阳”字而没有“阴”字,今天所知最早的“阴”字见于一件被叫做“敌簋”的青铜器上,而这件青铜器经考证是西周时期铸造的。我们不能判定殷人一定没有阴阳的概念,但按照“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道理,完整的阴阳学说出现于殷商时代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除非考古发现提供新的依据。《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唐代孔颖达注释说:“皆虚无之谓也。圣人以人事名之,随其义理,立其称号。”《周易·系辞上》中的“阴阳”不仅已经抽

象到了“虚无”的程度,而且是对举而言的,阴阳学说终于初露端倪了。可问题在于:《周易·系辞》是《周易》之“传”而非是“经”,大抵是战国时代的东西,并不出自西周。当然,我们还可以向更早推溯,《易经》中所有的“卦”和“爻”无不以“阴阳”为归结,所有的“卦辞”和“爻辞”无不用“阴阳”来演说,“阴阳”的概念在《易经》中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罢了。但是,“阴阳”概念的充分发掘,并不意味着“阴阳学说”的必定出现。在形式逻辑中,概念的出现是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的标志,概念也是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但是,有了概念不一定便有了学说,概念往往只是某种学说的萌芽或导源。因此,尽管“阴阳”的概念早已形成,但“阴阳学说”则显然要晚得多。另外,《尚书·洪范》中说:“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穡,金曰从革,水曰润下。”也只是简单表达了五行的概念,还远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说。从学说产生的外部条件看,

西周的生产力虽较殷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当时人在神秘莫测而强大无比的自然力面前仍很软弱,加之周天子“天下宗主”的权威、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与封建制度,以及“以德配天”的伦理观念,人们的心灵仍在来自“神”和“人”的禁锢之中久久徘徊。所以,殷商至西周的神学观是古代思想史专家们基本确定了的,唯物论思想的出现被大致圈定在春秋时代。

春秋之末,孔子首创私学,引导了此后诸子蜂起的学术繁荣,揭开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辉煌的篇章。关于阴阳与五行,诸子多有论说,今本《国语》、《老子》等中都可找到它们的踪迹。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天下学术为儒、墨、法、道、农、纵横、名、阴阳、杂、小说十家,除去“小说家”外被统称为“九流”,亦即“九家”。“阴阳”成为学术中的一“家”,相对较晚。战国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将阴阳与五行的各种论说加以归纳,强调“五德终始”,虽意在为人事服务,但客观上促进了阴阳说与五行说的总结和交融,使散见于诸子的有关内容形成了一个相对完

※基金项目 陕西省中医管理局医史文献重点学科工作项目(No:05071004)

● 作者单位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710003)

整的系统。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发端于殷周时期的“阴阳”与“五行”的概念,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发挥与补充,在战国中后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了一种与诸子之学并肩而立的学说。

中医从遥远的过去走到今天。无论是墨迹未干的现代专著,还是纸色苍黄的历史典籍,阴阳和五行的光影总是盈溢于其中。《黄帝内经》以后,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被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境界。阴阳五行对中医学术不仅有指导作用,而且有架构作用。今天,阴阳五行仍与中医学术紧密相关。在《黄帝内经》之前,阴阳五行学说就跟中医结下了缘分。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有十一种帛书和简册形式的古医书。经过专家考证,它们的著作年代要早于《黄帝内经》,大致在战国的晚期或中期。其中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是现在所知最早的经医学专著。关于经脉的命名,两部帛书虽有些微的差异,但对阴阳概念的运用却几乎同样娴熟。下面是两书的经脉名称:

《足臂十一脉灸经》中十一条经脉的名称分别是:

足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足少阴脉,足泰阴脉,足厥阴脉,臂泰阴脉,臂少阴脉,臂太阳脉,臂少阳脉,臂阳明脉。

《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十一条经脉的名称分别是:

足钜阳之脉,足少阳之脉,足阳明之脉,肩脉,耳脉,齿脉,足泰阴之脉,足厥阴之脉,足少阴之脉,臂钜阴之脉,臂少阴之脉。

值得注意的是:十一条经脉是无法按阴阳来对应命名的,而阴阳总该是对应的;再者,《阴阳十一脉

灸经》中出现了肩脉、耳脉、齿脉等名称。据此,这十一条经脉是否在更早的时候全部采用这种命名的方式,阴阳是后来才出现的呢?虽不能遽做定论,但可能性不能排除:经脉发现之初,可能是按照部位来命名的,人们对经脉的发现与认识早于阴阳概念的介入。

春秋后期,晋平公病重,向秦国求医,秦景公派医和前去诊病。医和虽表示了对病情的无能为力,却发表了一番非常有意义的演说。他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

这段话被认为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唯物主义病因学说。依传统说法,《左传》系战国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但《春秋》对医和入晋之事没有任何记载,可见两书关系并不那样直接。《左传》的成书时代曾有过很多讨论,比较集中的观点是战国中期,而这个时间恰好跟马王堆医书的著作时代大致相同或者接近。因此,阴阳五行学说影响到中国的医学,并成为中国医学的哲学指导和说理方法,应该不会晚于战国的中期。那么,战国中期以前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说到阴阳,往往必称伏羲和周文王。关于前者,毕竟还缺乏有力的史料证据。至于周文王演八卦为六十四卦,也只是今传《周易》的《易经》部分。《易经》只是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其抽象晦涩自不待言。正因为如此,战国人方蜂起为之作注,形成了今天所见的《易传》,即所谓“十翼”。《易经》以阴阳二爻演为六十四卦,阴阳的概念成为《易经》思想的基础,是不必讨论的问题。《易经》在战国时期应当已成专学,今传“十翼”便是当时“易学”的遗存。《尚书

·洪范》是最早叙述五行概念的古代文献,原被认为是周武王向箕子请教“彝伦攸叙”时的记录,后被孔子编入《尚书》,但今人仍然怀疑它是战国的作品。春秋之末而至战国“百家争鸣”,中国学术思想步入了空前的繁荣。但是,“百家”中除孔子外均在战国而不在春秋,而且诸子受阴阳说和五行说影响并不明显,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为诸子显学,并不见总以阴阳五行为说辞,倒是战国后期邹衍力倡阴阳五行说,成为先秦诸子中独立的一家,被班固列入“十家”之中。因此,阴阳五行学说影响到中医既不会晚于战国,恐怕也很难早于战国,这样的话,战国便成为了阴阳五行学说介入中医的最可能时期。

既然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医学产生影响是在战国时期,那么战国时期的中国医学又是什么状态呢?历史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拒绝与我们合作,它把当时几乎所有的风采都遮掩在了过去,传世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更使后人疑窦丛生。1973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是中国考古史上的惊天大发现,其中的十一种古医书曾在中医界和文化学术界引起研究的热潮。研究的结果是:它们所承载的内容跟今人熟习的中医有着极大差异,显得那样淳朴,那样单纯,那样的原生状态。

这是《五十二病方》中一条治疗“疣者”(疣病)的方子:

“令疣者抱禾,令人呼曰:若胡为是?应曰:吾疣。置去禾,勿顾。”

这是另一条治疗蛇啮伤的方子:

“蛇啮,以桑汁涂之。”

前者是用巫术来驱除疣病,似乎天真得近于可爱,却又实在是一种无奈;后者是用药物来治疗蛇啮

伤,在后世的本草书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方法。

从马王堆医书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中国医学处在一种相对质朴的状态,但已经开始了跟阴阳学说的结合,其中也可发现五行学说浸渍的痕迹。此前的中国医学应该更加质朴,而今人对它的了解几乎还是空白。但是,今人眼中的空白并不等于历史上真实的空白。当时的医学尽管一定是更加质朴的,却是绝对存在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是可能淡薄的,甚至是阙如的。那时的中国

医学可能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积累过程,更多的时候是在朦胧、迷惘、困惑与无奈中摸索前行,其发展的缓慢可能会超过我们今天的想象。经过人体实验乃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治疗方法在长期积累中越来越丰富,来自直觉和感悟的医学知识在叠经传承后越来越深厚,这些点状出现的知识需要一种纽带将它们贯串起来而成为一个系统的结构,尽管一些怎么治疗也不见效果的疾病仍然会逼迫人们向神灵去求助,但中国的

医学终于走到了应该总结归纳和整理提高的阶段。有关阴阳和五行的思想经过邹衍的整理发挥,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哲学学说,并向医学整体和加速渗透。中国医学在将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哲学指导和说理方法之后,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出现了《黄帝内经》这样的著作。因此,战国是阴阳五行学说介入中国医学并使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

参考文献(略)

(上接第62页)

mRNA 和蛋白质后,人们开始关注 leptin 与肝脏疾病的关系^[3]。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 leptin 与活化 HSC 间的关系、leptin 对细胞因子分泌的调控机制等方面。Leptin 在肝脏中的主要信号传递途径为 JAK₂-STAT₃ 途径。JAK (janus kinase) 是一类酪氨酸激酶,当 leptin 与其受体结合后,激活 JAK 激酶,JAK 酪氨酸磷酸化后与磷酸化受体结合,进一步使下游胞浆蛋白 STAT 磷酸化。STAT 磷酸化后转入核内,识别并结合到启动子区 leptin 的活化序列或相关序列,调控 leptin 的基因转录,促进肝纤维化的形成^[4]。

因此,阻断 HSC 中 leptin 诱导的 JAK₂-STAT₃ 信号通路,可能有望成为肝纤维化新的切入点,而中药复方制剂具有无可厚非的综合药效学作用。保肝宁^[5-7]是由黄芪、桃仁、丹参、黄芩等组成的临床常用经验方,具有益气健脾、疏肝活血、清热利湿的功效,其用药结合肝脏体阴用阳、忌刚喜柔、纯用活血化瘀易伤藏血之脏的特点,并且用于临床治疗以肝郁脾虚血瘀为主要病机的慢性肝炎患者,疗效显著。然而通过本实验研究,结果发现保肝宁正有抑制 leptin 诱导的 HSC 的增殖,并对其引起的 JAK₂-STAT₃ 信号转导通路有阻断的功能,这就为进一步阐明保肝宁抗肝纤

维化的可能机制提供了实验依据,亦说明保肝宁可能具有多靶点、多途径而又相互关联的多功能网络效应,同时,也为临床治疗肝纤维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Zhang Y, Proenca R, Maffei M, et al. Positional cloning of the mouse obese gene and its human homologue[J]. Nature, 1994, 372(6505): 425 - 432.
- [2] Friedman SL. Molecular regulation of hepatic fibrosis, an integrated cellular response to tissue injury[J]. J Biol Chem, 2000, 275: 2247 - 2250.
- [3] Potter JJ, Womack L, Mezey E, et al. Transdifferentiation of rat hepatic stellate cells results in leptin expression[J].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1998, 244: 178 - 182.
- [4] Ahima RS, Flier JS. Leptin[J]. Annu Rev Physiol, 2000, 62(4): 413 - 437.
- [5] 赵进军, 吕志平, 刘永刚, 等. 保肝宁对过氧化氢损伤大鼠肝细胞的保护作用[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2, 19(3): 211 - 213.
- [6] 张绪富, 吕志平, 周迎春, 等. 保肝宁对 HSC-T6 细胞增殖及 I 型胶原表达的影响[J]. 中医药学刊, 2003, 21(2): 207.
- [7] 刘晓燕, 吕志平, 张绪富, 等. 保肝宁对 HSC 中 NF- κ B 影响的实验研究[J]. 陕西中医, 2004, 25(6): 569.